



我本陋民

——
柏杨自传

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我本陋民

——
柏杨自传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本陋民——柏杨自传/柏杨 - 西安: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2. 08

ISBN 7 - 5613 - 2398 - 0

I. 我… II. 柏… III. 柏杨 - 自传 IV.

K825. 7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75969 号

我本陋民——柏杨自传

作 者: 柏 杨

责任编辑: 柳永承 执行: 鸿雁工作室

装帧设计: 轩辕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(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)

邮编 710062)

印 刷: 阳光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: 850 × 1168mm 1/32

印 张: 18

字 数: 420 千

版 次: 2002 年 9 月第一版

印 次: 2002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

印 数: 1 - 3000 册

ISBN 7 - 5613 - 2398 - 0/I · 324

定 价: 28.80 元

作者简介

柏杨 BAIYANG

原名郭衣洞，台湾著名作家，学者。

祖籍重庆，1920年生于河南，童年的柏杨是在继母的凌辱下度过的。1937年投考河南省军事政治干部训练班。1948年与友人徐天祥、孙建章在沈阳筹设《大东日报》。1949年随恩师吴文义到台湾；同年，进入屏东农业职业学校。1957年在国立成功大学任教。1960年开始以笔名“柏杨”在《自立晚报》撰写“倚梦闲话”。1967年为《中华日报》负责人，同年引发了著名的“大力水手”事件，因而入狱。1977年获中国大陆问题研究中心聘书。1979年在狱中著《中国人史纲》。1985年8月，出版《丑陋的中国人》；《柏杨版资治通鉴》当选为台湾最有价值和最畅销的一部书，1993年完成全部《柏杨版资治通鉴》，1995年完成《柏杨回忆录》。

我本陋民（自序）

苏东坡有一首诗：“人生到处知何似，恰似飞鸿踏雪泥。泥上偶然留指爪，鸿飞哪复计东西。”充满人世沧桑的伤感，从小就在我心头回荡。正像我一样来自北国大地，冬天万里雪飘，雪地上一趾一履，痕迹都十分明显，可是，大雪继续纷飞，任何痕迹都会被湮没。

人生，正是如此。一个人从呱呱坠地起，就命中注定要一个人走完他生命的全程，不管他是欢乐还是愁苦，不管他有许多伙伴还是孤单一人，也不管全程是长还是短。

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够再回到他的起点，重踏原来的脚印，因为大雪继续纷飞，原来的脚印已经不见了。只有少数幸运的人，借着回忆录、自传之类的文学作品，才能像飞鸿一样，重返他的来时地，重寻过去留下的痕迹。脚印埋藏在万丈深处的底层，外人看起来，不过一片冰天雪地，但从那万丈深处的脚印上发出的人性温暖，往往使飞鸿回肠荡气。

就在这里，埋葬着他的往事，是欢乐、是悲哀、是歌声、是哭泣，一一涌上心头。

多少年来，朋友们一直劝我写自传，我也认为每一个人都有写自传的义务，把他们的时代真相，留给后人。可是，想不到，当我打算开始的时候，一连串事情发生：心脏病发作、视网膜出血，以及脊椎开刀，体力和视力大不如前，好像一个身经百战的沙场老兵，当他提矛跨马，轮到要为自己冲锋陷阵时，却已提不动铁矛，跨不上战马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周碧瑟博士挺身助我完成心愿。她是一个最好的工作伙伴，态度的认真和工作的狂热，使我感动。她每天乘车一个半小时，从学校到我家，一进家门，一分钟也不停地开始工作，三个小时后，再乘一个半小时的车赶回学校。没有她这份坚强的意志，这本书不可能完成。就在她的扶助下，我这只飞鸿，从原出生地太行山下的一个村落，重新飞过几十年的漫长旅程。

日本作家黄文雄先生曾引用日本的一句谚语，说我是一个看过地狱回来的人，他指的是1970年台湾恐怖时期我几乎被政府枪决。实际上，我不仅看过，而是我一生几乎全在地狱，眼泪远超过欢笑。在写作途中，我常常把笔放下来，凝视着我的夫人，便笑着叹息说：“现在看来我的灾难，怎么没完没

了？”但我心里并不认为我是天下最受苦的人，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比我更苦，这是民族的灾难，时代的灾难，而不是某一个人的灾难。

回顾风沙滚滚的来时路，能够度过这些灾难，我比更多的中国人要幸运得多，这使我充满感恩之情。我的妻子香华在我视力衰退的时候，曾经说过：“我是你的眼睛。”果然，她帮助我校对完这本书。

而给我鼓励最多的朋友：陈宏正先生、王荣文先生、苏基先生，这三位难得的伙伴，我有幸结识他们，没有他们，这本自传根本不可能提笔。

我的经历比较复杂，早年追随国民党反共，后来又对国民党政治以及蒋氏父子的家天下做法表示强烈不满，近年来，我又不甘寂寞地站了出来向阻碍社会前进的一些劣习旧根，作了无情的讨伐。

以前有首哀歌，一直在辉县广大的土地上飘荡。这就是老祖宗留下的一段话。

两千余年之后的今天，辉县已很少有人记得这件事，它太遥远了。现代的辉县人，尤其是居住县城东北六公里的常村郭姓居民，他们所有的记忆，最远追溯到三百年前那个令人作呕的明王朝末年。

那是一个无边无涯的大黑暗时代，整个中国北部大约五百万平方公里、比一百五十个台湾都要大的面积上，发生被贪官污吏制造出来的可怖饥荒，

旱灾、蝗灾，所有含叶绿素的叶子，全被啃光。大地如焚，河水干枯，一片焦土。饥饿的灾民，互相交换子女，烹杀煮吃，当孩子们都被吃尽的时候，他们吃观音土——一种白颜色的松软石头。

这种观音土经水煮过，会变成浆糊，人们把它喝下去，暂时填满肠胃，可是不久它就凝结，恢复成石头硬块，既不能消化，又不能排出，直到一个被活活胀死。

就在山西省洪洞县，一个郭姓大家族几乎被饥饿消灭，有一日，全部残存的一些族人，围绕在一棵大槐树下，把一个铁锅摔破，分给每一个支派的族长，然后互相祝福，四散逃命。他们相约等这场灾难过去（人往往认为灾难会过去，以寄希望于未来），总有一天，大家从四面八方返回故土，重建家园。万一到时候子女已互不认识，锅片就是信物，可以为证。

于是当中有一支从洪洞县出发，向东逃亡。那是一段悲惨凄凉的旅程，中途幼儿夭折，老年人逝世，沿路写下悲苦的河南辉县先民移民史。他们翻过高达两千米的山，继续向东逃亡，终于在太行山东麓的辉县定居，他们的子孙一直传到现在。转眼三百年，锅片已经不知道何处而去，子孙们对往日大槐树下摔锅片的故乡，早已失去记忆。

今天，当辉县人被询问到这个故事的时候，他们一脸茫然的表情，透露无限人世的沧桑。而我——柏杨，就是这支苦难先民的后裔。

从自幼丧母、饱受后母虐待的童年到追求自立、四处漂泊的青年，从投笔枪的事业到高压下不幸的婚变，从漫长的牢狱之灾到晚年迟到的幸福，人生真像一瓶打翻的五味瓶，各种各样的滋味搅和在一起，再也分辨不出了。在这本自传中，我对自己的一生作了最为真切的回顾。我是悲情台湾的帷幕下扛着沉重的闸门的人之一。但我并没有以之为自豪，相反，我谦卑地、冷静地回忆着过去的一切。与李敖在《李敖快意恩仇录》中的笑傲江湖、老而弥狂不同，我的自传保持了一种较低的调子，正像我自己所说的：“我并不认为我是天下最受苦的人，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比我更受苦，这是民族的灾难，时代的灾难，而不是某一个人的灾难。回顾风沙滚滚的来时路，能够度过这些灾难，我比更多的中国人要幸运得多，这使我充满感恩之情。”我相信，我的这种说法基本上是真誠的。

我既写杂文又写小说，不可否认我对自己小说很得意，但无可质疑的事实却是：作为写杂文的我比写小说的我成功得多、重要得多。杂文给我带来声誉，也带来灾难；杂文使我家庭破裂，也使我

成为台湾民主化的先行者之一。当惊涛骇浪过去以后，我解释当年自己为什么要选择写杂文：“杂文富于社会批判功能，像一把匕首或一条鞭子，它虽不是鲁迅先生所创的文体，但却由他发扬光大。它更是对抗暴政的利器，因为它每一次出击，都直接击中要害。”在50年代之后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，败退台湾的国民党在孤岛上实行严酷的白色恐怖，造成严重的后果：“在那个威权至上而肃杀之气很重的年代，文化像一片沙漠，社会如一潭死水。”在这样的时代，有多少人“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；若为自由故，两者皆可抛”？而我当之无愧的是其中几个最坚贞的自由知识分子之一，“一遇到不公不义的事，就像听到号角的战马，忍不住奋蹄长嘶”。

我在自传中再次揭露了调查局的残忍和凶暴。在极权主义横行的地方，秘密警察享有“治外法权”，是邪恶力量最集中的代表。由蒋氏父子直接控制的秘密警察，制造了罄竹难书的、比皇权时代更骇人听闻的文字狱。阿伦特说：“恐怖手段是极权主义政府管理的真正中介。”我在书中谈到一个名叫沈源璋的女记者的遭遇：她的全身被剥光，在房子对角拉上一根粗大的麻绳，架着她骑在上面，走来走去。她哀号和求救，连厨房的厨子都落下眼泪。那是一个自有报业史以来，女记者受到的最大羞辱和

痛苦。当她走到第三趟，鲜血顺着大腿直流的时候，唯一剩下的声音，就是：“我说实话，我招供，我招供……”她要求调查员们把她放下来，暂时离开，允许她自己穿上衣服。调查员离开后，她知道更苦的刑罚还在后面，自己招供不出从来没有做过的事，于是就在墙角上吊身亡。我悲愤地说：“这个60年代的著名记者，除了留下若干有价值的采访文稿外，最后留下来的是一双几乎暴凸出来的眼睛，和半突出的舌头。”我还涉及到当年亲自审讯、毒打自己的调查员刘展华。在我出狱以后，刘展华死不忏悔、百般抵赖，摇身一变成了保护民主人士的“好人”。

有一次两人见面，刘展华春风满面，热情地握着我的手，好像是昨天才分别的老朋友，夸奖我气色不错。当我的妻子质问他当年打人的经历时，刘展华忽然间紧靠我，双手握住我的手臂，微笑着说：“柏老，我们从来不做这件事，你说是不是？”面对他“坦荡无邪”的表情，我不知道如何回答。刘展华身上的“人性”早已荡然无存，他完全沦落为极权主义的“螺丝钉”。他从属于体制，所以他是“无罪”的——当年也在为“真理”而兢兢业业地工作。对于秘密警察制度，我有深刻的反思：“情治单位有存在的绝对必要，但运用不当时，也会凌虐人民，所以我希望，严防它成为维持一个人或一个党的权

力的工具，必须在保护人性尊严的大前提下办案，使情治单位成长为国家必要的善。”而要实现我的理想，根子在于摒弃极权社会，建立民主社会。

在读这本自传的过程中，我多次被其中的细节所感动。在书中的我，我希望自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人权和民主的斗士。

风流不下流

经过了一番假文凭的嘲讽，我日益感到自己在麻木的旧中国国民中间站不住脚。我要走了，“九一八”的枪声震醒了我的春梦，我在河南省军事政治干部训练班的学业已快完成了，这时，我刚好与艾绍荷完婚，父亲去逝了，给我们的婚姻蒙上了一层阴影。

我的家在台湾，但根却在大陆。我说：“大陆可恋，台湾可爱，有自由的地方就是家园。”一生漂泊的我在大陆呆了29年，这29年，是一个年轻人付出努力却化成一片模糊的眼泪的时期。

对于许多往事，今日的我都已经释然了。但对留在大陆的两个女儿及两位妻子，尤其是次女崔渝生及第二位夫人崔秀英，我却一直怀着深深的歉疚。

1943年，举目无亲的我在重庆的两路口上清寺一带徘徊，在“中央团部消费合作社”，我巧遇下班

出门的女职员崔秀英，崔听我是同乡，心中顿生怜悯，就把我带进合作社，介绍给她的同事，留我住了一晚。在重庆的那段时间，我一心想考取中央大学来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，可是偏偏名落孙山。在人生最失意的时候，爱情不期而至，“在万般落寞中，（我）和崔秀英发生了感情，仿效当时最流行的办法，我们在两路口租了一个房子同居”。

生活在困境中出现了转机，我去了南迁至四川省三台县的东北大学。上大学后不到一年，崔秀英为我生下一个女儿——乳名毛毛。可是大学毕业后前途依旧渺茫，许多东北籍的同学都劝我到东北另创江山。可是妻子崔秀英坚持说要先回河南息县老家看看再去东北，老家有她的姥姥和寡母。我也改变了主意，希望先送她回家，再回河南辉县看看我那仓促离开的结发妻子艾绍荷（当然，我对崔秀英隐瞒着这段婚姻），然后再下决定。

1946年秋天，刚回到河南息县不久，就碰上了大别山的解放军攻打息县城。我叫妻子火速收拾东西，随即匆匆赶往息县西关探听消息，并看能不能雇到架子车。等我雇了架子车回城时，走到城下，却见城门紧闭，城上的守卫大声警告快点离开，解放军就要攻城了。惊慌失措的我在城外田野里躲了一夜。第二天向西奔至信阳，遇到了一个同学，心

一横，决定去南京。但在南京也无法谋得一席之地，息县妻女也探不到一点消息。万般无奈，我决定仍去东北，等待时局平静再回息县接妻女。却没想到，河南走散，一别就是四十多年，女儿对父亲的离别是没有印象的。

可是当年女儿拍着凳子对父亲说：“爸爸坐，坐！”这句话，却让父亲刻骨铭心，一生难忘。

北京和平解放时，好友徐天祥选择了留在大陆，而我选择了逃亡。徐天祥从口袋中抓出一叠银元，放在桌上，一个一个把它高高地叠起来，然后用手指指数了数，整整14元，徐把这些银元推到已经身无分文的我面前。14个银元足够我逃到上海，到上海后，孑然一身的我爬上了开往台湾的轮船。

台湾只有我一个人敢讲真话

遭遇了生离死别诸多变故的我，上世纪50年代在台湾开始写小说，但我的作品在五六十年的台湾产生重大影响的，还是杂文。

当时台岛所有的警察局和派出所墙上，都有九个字的斗大标语：“作之师，作之君，作之亲。”我认为这简直是只有发高烧的人才能想出来的荒谬念头，一个警察居然自命是人民的教师，已够自大，还要当人民的君王，我认为其心可憎，最后还要当

人民的爸爸，这就更不可宽恕。于是我在杂文中给警察先生取了一个绰号，叫“三作牌”，文章面世后引起很大的回响，以致后来人写稿写到警察时，往往用“三作牌”来代替。这个绰号造成两个后果：第一是在提出这个绰号后一年半左右，警察局墙上的标语全部涂消；第二是全体警察的怒火，集中在我一个人身上。十年后我被捕时，政府组织了三人专案小组负责侦讯，警务处专门指派了代表参与。

我走进了眼睛看得到的社会和政治的底部，最后，再走进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，终于发现政治改革之所以困难，全由于传统文化上的恶质发酵。因此我不断呼喊，企图来解除台湾人心灵上滞塞的困顿之情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我这份盼望台湾社会进步的沉重心态，正是把自己绑赴刑场的铁链。

1968年3月7日我被逮捕入狱后，要求处死。其后，又被改判有期徒刑12年。

我先被羁押在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看守所，十平方米的押房中，挤满了赤身露体、只穿短裤的难友。当大家知道这个入狱的人是我的时候，难友们发出一阵惊呼，有人说：“台湾只有你一个人敢讲真话，还以为有人给你特别任务，做榜样给外国人看。”

羁押不久，我身上已经没有了肌肉，瘦枯的骨骼，被失去水分的焦黄皮肤包住。在难熬的监狱生

涯中，我读到了《资治通鉴》，借古鉴今，我全身心地投入写作，完成了三部史书：《中国历史年表》、《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袭录》以及《中国人史纲》。

我用早上吃剩的稀饭涂在报纸上，一张一张地黏成一个纸板，凝干之后纸板就象铜板一样坚硬。我每天背靠墙壁坐在地下，把纸板放在双膝上，在那狭小的监房里构思挥洒。困境中的我建立了自己最基本的历史观：为小民写史，而不是为帝王将相写家谱、写嘉言懿行。我想突破两千年以来被视为正统的、以朝代为单元的体裁，改用世纪（100年）为单位，使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，得以更明确地显示出来，还想把历史上那些令人头昏脑胀的官名，一律现代化。

蒋经国终于放了我

我被捕以后，与我从未谋面仅仅书信往来的孙观汉先生（孙先生是物理学博士，曾出任台湾清华大学原子科学研究所所长，建立台湾第一座教学用的原子反应炉，因此后来被尊“中国原子科学之父”。）在美国发动大规模的请愿活动，要求美国政府向台湾当局施压释放柏杨，但未获成功。

对政治犯而言，坐牢是和暴君生命的一种比赛，

看谁活得更久，谁活得更健康。我决心参加这个比赛。

结束我监禁生涯的，是美国众议院议长伍尔夫先生。

孙观汉在美国长达八年的呼号营救，终于让美国政府下定决心迫使台湾当局无条件地释放我。伍尔夫到台北访问，质问蒋经国：“柏杨哪里去了？”得到的回答是：“他自己愿意留在绿岛指挥部当教官，如果不信，我们有他亲笔写的申请工作的报告。”伍尔夫表示他要亲自去绿岛，当面问个清楚。蒋经国的态度立刻转变。

1977年4月1日，我获释。后来我有诗长叹：

九年零二十六天/今日踉跄回台北/人物都非两
渺茫/去时家园如完瓯/于兹覆巢鸣寒蜚/念我身老童
心在/仍将丹忱酬热肠/先把无穷感恩意/第一修书报
孙郎/

差一点胎死腹中的《丑陋的中国人》

出狱后，朋友们对我孤单的情形一目了然，大家热心地为我介绍女友，最后，在文化大学教授史紫忱先生做东的一次聚会上，我认识了诗人张香华。

1978年2月4日，我和第五位妻子张香华结婚。相伴晚年。